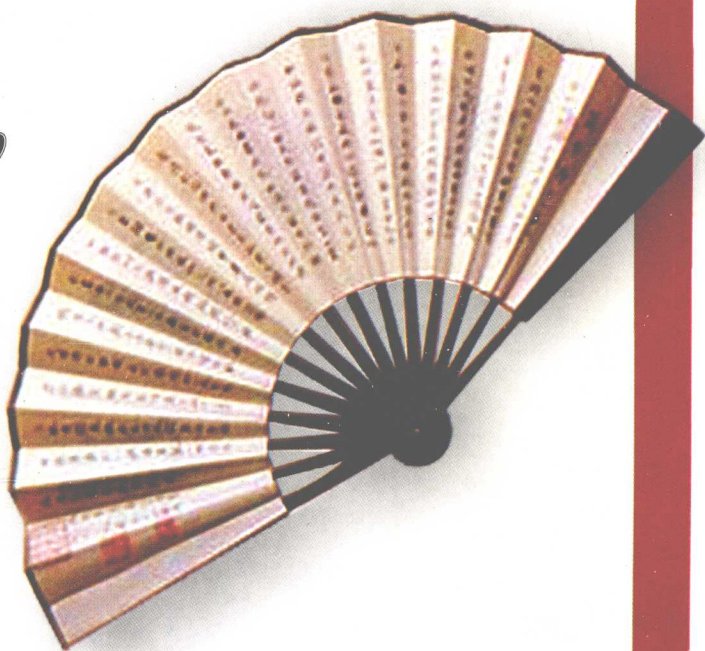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献学纲要

*Zhongguogu
daiwenxian
xuegangyao*

杜道群 主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56.1 / 6

中国古典文献学纲要

杜道群 主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献学纲要/杜道群主编.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81092—492—4

I. 中… II. 杜… III. 古文献学—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392 号

中国古代文献学纲要

杜道群 主编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712100

电 话 总编室:029—87093105 发行部: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罗山盟达彩印公司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ISBN 978—7—81092—492—4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前言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还为光辉灿烂的现代中国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中国古代文献学就是一门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探索其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科学。古文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最为密切的宝贵财富。对于文化渊源如此深厚的泱泱大国,继承文化遗产,弘扬文化传统,整理、研究并使中国这些古代文献流传下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古代文献学主要研究的是:一、古代文献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文献资料的积聚与散佚、材料与形式、部类与体式等。二、古代文献整理的内容与方法:就是求真(即运用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以求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保持文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整序(即通过目录、类书、索引等各种工具书的编撰,为人们认识、利用、研究文献提供方便);释读(即通过标点、注释、今译等手段,对古代文献学进行解释,以便人们更准确的理解原文)。三、古代文献整理的历史,主要介绍古代文献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历史上古代文献学家的经验和成果,为今天的古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文献在历史上遭遇过的几次大的劫难,我们深表痛心和惋惜,这些痛心疾首的往事,我们世代都不应该忘记。所以,如何提高我们现代人对古代文献的认知能力,如何将古代文献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学”的大视野大背景下去考察研究,如何有选择地继承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文献的丰富遗产,确是一个关系到国民文化素养的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献学作为一门普及性的知识门类,走进高等学校的课堂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古代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在今天走进高等学校的课堂,应该归功于这么几位学者和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成就:郑鹤声、郑鹤春兄弟1928年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魏建功先生,1959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培养古文献学和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专业——古典文献专业;我国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微先生出版的《中国文献学》一书,构建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体系、思想和方法,堪称中国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他创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推动和促进了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程千帆先生通过对“校雠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版本、目录、校勘三大主干知识之外,又加上了典藏之学。尤其是程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熟练地运用到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之中,使中国古代文献学获得了崭新的生命。

以上几位学者,乃至后来的一些文献学的研究者们,他们对传统典籍和文献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研究成果惠泽后学。我们作为后来者,从中汲取不少知识的营养,为我们对古代文献学的研究和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代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主体内容是阅读、研究、整理和利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前产生的文献,即以文言文和繁体字书写的文献;也包括对中国古代文献在书写、编集、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的研究。文献学既然是作为一门学科,理应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历代文献学者不断对文献学研究做出科学的总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技巧;文献学包罗万象,作者在本书中分别在不同的章节中向读者介绍了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版本鉴定等方法。

古代文献学作为一门课程,已经走进了高等学校的课堂,但是,在课堂上应该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哪些知识,以及学习这些知识有何作用,我们应该向学生讲解清楚:目录、版本、校勘是文献学的“三位一体”,是古代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是主要解决文献著录的类别性及文献自身形态(如物质形态、文字篇章等)的可靠性问题;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文献学另一分支学科的

“辑佚”，既是古典文献成书的一种著作形式，又是古代文献的一种整理和研究方式，主要研究辑佚活动的基本规律，总结辑佚活动整体过程、原则、方法及相关的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研究，迄今为止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欣喜之余，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关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仍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学科体系的建设还需大量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文献观、文献学史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讨还不足。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文献量的飞速增长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文献类型的变革，新型文献、文献新载体与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用、阅读等，对文献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在利用现代化手段研究文献的揭示、整理、检索、计量、利用等方面的同时，对古代文献学的研究，也应注入新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来开发利用古籍，使之创造性地转化，形成古籍文献加工自动化、信息资料电子化、存取网络化，重新满足社会新的需求，实现古今文献的真正交融。

当然，任何一门学科要想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并在未来有所发展，就必须探讨如何与时俱进、发扬传统。正因为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中国古代文献学永远具有时代的气息和色彩。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实际上是“古为今用”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人们对传统文化反省的过程还停留在鉴别精华和糟粕的浅层次，没有进入深层结构。目前亟须借助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反观传统、解释传统和调整传统内部的结构，尽可能较为全面地对积淀在传统训诂学深层的内涵进行发掘，创建具有现代特色的中国古代文献学理论体系。

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都需要民族经典文化的启迪，任何经典都需要在人们的不断解释中弘扬其生命价值。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建设同样也要与时俱进，探讨古代文献内在的精神资源，以其作为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个支柱。

目前，我们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复兴时代。社会的变革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新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古代文献是历史的主要载体，要建设今天的中国，发展今天的中国，不能不深入了解和评判昨天的中国、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整理研究古代文献，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绝不能以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道德的沦丧作为代价。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厚的。当前我们的任务是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国古代文献学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本人编撰此书的目的，主要是给有致力于探求中国文献宝藏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充当一个进入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殿堂的向导。

本书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考订、编纂、注释、检索等方法，在内容编写上也很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特别是古代文献的整理方法，没用太多的求证和举例，只是介绍了一般的技巧与方法：版本的鉴定、整序、校勘、辨伪、辑佚、释读等；因为整理古代文献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有大量的实践工作经验。

由于本人学识、能力所限，涉猎不广，错误和缺陷在所难免，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指正！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大新教授欣然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我深表感激；本书的出版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李洁苗编辑、罗山盟达彩印公司的大力鼎助，在此一表深切的谢意。同时，在此也感谢给予我大量帮助的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同仁们；感谢平时一贯关心、支持、鼓励过我的老师、同学、校友和朋友们！

杜道群
2008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文献的概念	(1)
第二节	文献的载体形式	(3)
第三节	文献的形成与传承	(8)
第四节	文献的分类	(15)
第二章	文献的收藏与散佚	(17)
第一节	历代官府藏书	(17)
第二节	历代私家藏书	(19)
第三节	文献的散佚	(20)
第三章	版本学的基本知识	(24)
第一节	版本的定义	(24)
第二节	版本学的作用	(25)
第三节	版本的结构	(27)
第四节	版本的特点	(28)
第五节	版本的类型	(29)
第六节	版本的鉴别	(31)
第四章	文献目录学概要	(33)
第一节	目录和目录学	(33)
第二节	目录学的作用	(34)
第三节	目录的体例	(35)
第四节	古代目录分类学	(41)
第五节	目录的内容和类别	(45)
第五章	文献的整理	(50)
第一节	校勘	(50)
第二节	辨伪	(59)
第三节	辑佚	(62)
第四节	注释	(64)
第六章	类书、政书与丛书	(77)
第一节	类书	(77)
第二节	政书	(85)
第三节	丛书	(89)
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史文献举隅	(97)
第一节	诗词文集类文献举隅	(97)
第二节	文学评论类文献举隅	(112)
第三节	史传类文献举要	(117)
附录	常用文史工具书书目	(119)

第一章 概述

中国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密切关联。同时,古代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它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因此,中国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代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包括经学、文学、历史、哲学等)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搜集、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代典籍以加强文化素养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代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古代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

第一节 文献的概念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国名,夏禹之后,周武王封,在今河南杞县。宋,国名,商汤之后,亦周武王封,在今河南商丘南。礼,指典章制度,为大家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征,征验,证明之义。

南宋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中注释此段文字道:

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

朱熹在这里明确指出,文,即指典籍,献,即贤才。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最先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作,他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贯通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著名政书。在《自序》中,马端临对“文献”一词的涵义也做了说明: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由此可见,《文献通考》的取材有两个方面:一是书本的记载,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

“文”即指典籍,什么为典籍呢?《礼记·中庸》有云:“(鲁)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里,孔子告诉鲁哀公,周文王、武王治国的方略都记载在典籍上。方策,即指典籍。

“献”指贤才,什么是贤才呢?《论语·子张》云:“已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贤才,指的就是博学多识的人。对于孔子的学生们来

说,《易》、《书》、《诗》这些典籍即是文,他们的老师就是献。对于孔子,“布在方策”的典籍是文,而那些能识文武之道的贤才,就是献。由此看来,文和献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文,可能是昔日的献,而今天的献,又可能是将来的文。因此,文献,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是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验证历史的依据,它可以是书,也可以是人,统称则为“文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一词也逐渐演化为偏义复词,偏重于文,尤其偏重于古代的文。但文献一词的本义还是指典籍和贤才的。如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首先用“文献”一词为书名的。明代学者焦竑亦写了一部著作,叫《国朝献征录》。国朝,即作者生活的那个朝代,也可理解为当代,献,指当代的重要人物,用现代汉语译一下,即为《当代人物(名人)传》。

值得注意的是,将书本记载和宿贤议论共依并重,交相为用,是古代学者治学之通则,并不是从马端临才开始的。司马迁《史记》在记叙史实的同时,收录了不少文辞、言论;班固的《汉书》中,凡是与学术、政治相关的重要论文,亦都一一载入传中。此后,历代正史,也都沿用了这一体例。如果再溯流而上推之,《尚书》中的《典》,叙述事实;《谟》,记载言论。《左传》一书,于叙事之外,常用“君子曰”以抒发言论。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以“文”和“献”为主要内容,起源很早。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一词的意义渐渐发生了演变,元代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东土校全经”,其“文献”之义已经与今天“文献”的内涵接近,特指典籍资料。明成祖时,编《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也取义于包含各类图书在内的意思。稍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将“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概念,尚未有一个公认明确的定义。各种辞典和专著对“文献”的解释歧义迭出,莫衷一是,如《辞海》释之为:“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辞源》释之为:“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现代汉语词典》释之为:“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文献》1985年第4期刊载的邵胜定《说文献》以为:“文献就是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一切领域内人类活动(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及所取得的文明进步),对后代说来是具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作用的,以文字记录形式(后世还包括音响和图象的形式)存在的资料。”

大体上可以说,历史上用文字(或图像)记录下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一切具有利用和参考价值的文本及图像资料,都属于文献范畴。

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文献”一词的涵义也会不断地拓展和延伸。

文献而成为学,就要有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文献学的范围,主要包括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从时代而言,可分为古代文献、近代文献、现代文献、当代文献。从学科而言,则可分为语文学文献、文学文献、历史文献、哲学文献、科技文献、法律文献、经济文献、医学文献等等。从组群而言,又可分为出土文献、地方文献等等。

文献学是通向文献宝库的门径,是打开文献宝库的钥匙。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在《车茵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中指出:“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而欲得之“门”,即是文献学。实际上,古今中外文献之繁富,不可胜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较短

的时间、有限的精力读自己最需要读的书,查找搜集最必需的文献资料,以从事个体的专业研究,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是每个研究者必须思考的学术门径,只有这样方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学习文献学,就可找到这个进入知识殿堂的大门。

第二节 文献的载体形式

一般说来,我国文献典籍的载录形式主要包括简牍、帛书、纸写本、印刷(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图书等四大类。它的产生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我国自远古时期就陆续用甲骨、金属、石头、竹木、缣、帛等作为文献的载体。从古到今这些载体的演化情况又是如何,在这里略作追述。

一、甲骨

甲骨一般指龟甲和兽骨。龟甲主要指龟的下甲,也叫腹甲,较为平整。兽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也有少数为其他大型野兽的骨片。用甲骨为载体刻记占卜文字,在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从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偶然发现甲骨文,到1991年9月,在今河南安阳县西北的小屯村,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记事年代从商代的盘庚到纣王末期(前1300~前1028)。记载的方法及程序大约是:先在龟甲或卜骨上凿穴,然后再在火上烤灼,视其裂纹(兆)如何,以此来预定吉凶。“卜”即裂纹之状。然后就在裂纹附近刻上占辞,内容包括时间、事件、占卜之人、占卜结果。事情发生以后,还刻上灵验与否的验辞。由于它包括纪年、帝王世系、占卜的各种商代的文件,所以成为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又保存了我国早期的象形文字。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有系统的文字仍以甲骨文为最早。因为这是殷朝的一种文书,所以后来人们又称甲骨文为殷墟文字。

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殷人对于田猎、农事、天象、年成、征伐、疾病、祭祀等活动的占卜记录。甲骨较硬,文字是用刀刻上去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古老而有系统的文字记录,它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仅是记录在案的史实,形同档案,同用于传播知识、交流思想、记录经验的书籍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可见甲骨是我国文献的最早的载体。

甲骨文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4672字,附录2949字,可识者达900余字,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甲骨文刻辞中当时所见的已释和未能释定的单字,基本上已收录齐备,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关于“独体形声字”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义,他所编著的《甲骨文字释林》及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代历史的煌煌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万多片,按五期分22类编纂而成,全书共13册,它集我国80年来出土甲骨文字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二、青铜

我国先秦时代称铜为金。古人在铸造青铜器物时,往往也铸上铭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

的金文,因而金也成为古文献的载体。当然,也有少量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其产生时代为商、周、秦、汉,以周为最多。青铜,指铜和锡的合金。由于所铸器物的不同,铜、锡的比例不同。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礼器(即祭器)、乐器两大类,此外尚有兵器、食器、农器、度量衡和钱币等。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又往往用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因而铜器铭文亦称“钟鼎文”。

从西汉开始,历代都有青铜器发现。宋代以后,随着青铜器出土的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从事青铜器的系统研究,吕大临《考工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至今仍然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朴学发达,金石考据之学更是盛极一时,学者们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成就斐然。吴大澂《字说》、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均是研究金文很有影响的专著。而王国维的《说觥》、《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文,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研究青铜器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陕西省博物馆及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等。而容庚的《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周法高的《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则是查考金文的重要工具书。

三、刻石

在青铜器上刻字比刻石难,一是青铜贵重,二是石头随处可得,三是石头载文面积大,四是加工工艺简便。比青铜器有更多的优点。我国石刻文字十分丰富,主要有玉册、碣、摩崖、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行各地,刻石记功颂德,史凡六见,芝罘石、碣石久失不传,泰山石毁于火,峰山石、会稽石乃后人重摹,琅琊台石至清咸丰、同治后坠于海,后捞得,残存13行87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秦刻石字体为小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为史料的范例。

从东汉末年开,人们将儒家经典刻在石板上,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

三国魏曹芳正始二年(241),依嵇康等奏请,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尚书》、《春秋》二种,史称“魏石经”。

以后隋唐五代、两宋、清代都在石头上雕刻经典。历代石经以汉唐石经的史料价值最高,对后代的影响最大,后世雕版刻印经书常常以之为范本。除石经外,历代墓志碑文也保存了很多史料文献,留下了各种拓本,足资研究考证文史之用。

碣,《说文》谓:“碣,特立之石。”李贤《后汉书·窦宪传》注云:“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可知碣就是石柱,下大上小,形状在方圆之间。现存最早的石鼓,虽说高度较低,仍可说是石柱,属于碣。共有十鼓,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摩崖,指刻于天然石崖、石壁之文。在名山之崖壁随处可见。石刻文始于秦始皇。著名的有今陕西褒城县的《石门颂》,为汉建和二年(148)刻,隶书。泰山东岳庙后石崖的《纪泰山铭》,为唐代开元十四年(726)刻,唐玄宗亲自以隶书撰写。

碑。碑之名起于周。墓所之碑为木,用以引绳下棺。庙门之碑为石,用以丽牲和测日影。西汉时始有人将文字刻于碑上,到东汉方才勃兴。开始碑是一块整石,碑首上有一圆孔。后来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碑身部分为长方形石板,故又叫“碑版”。碑首叫额,碑座叫

跌。正面叫阳,北面叫阴,左右曰侧。额刻标题,阳刻文,碑阴、侧刻题名。也有阳阴面各刻一文的,也有阳面刻不完接到阴面的,也有只树碑而不刻一字的,如武则天的无字碑。最高的碑是明永乐皇帝为洪武皇帝凿刻的纪功碑,碑身高49.4米,全高为90米。

墓碑立在墓前,故又称神道碑,是供人瞻仰的。东汉时又出现了墓志铭,记该墓主人的生卒年月、姓名、籍贯、事迹。内容与碑文相似,但是埋在墓圻之中。今西安碑林展室中有不少出土的墓志铭。

碑除了用于丧葬外,还用于纪功纪事,表彰功德。修桥、修路、修城、建庙等,都有碑记其事,如韩愈的《平淮西碑》。还有的撰刻名人书法的,今许多城市均有类似的碑林。唐代,科举制度得到完善定型,始有进士题名碑。今北京国子监院内就有不少明清进士题名碑。

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石鼓,时代约在春秋战国期间,在10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多为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字体为籀文,后人把这种刻在石鼓上的文字称为“石鼓文”,亦称“猎碣”。

以上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正式书籍,他们本身有另外的目的,不是以抒情、记实、传播思想为目的。

四、简牍

大约在殷商之际,古人已经开始使用竹简和木牍。竹,指用竹子做成的长而窄的竹片,也叫竹简。木,指用木头做成的长而窄的木片,也叫木牍。竹简和木牍的出现很早,甲骨文里就有“典”字和“册”字。“册”,就是把许多竹简和木牍编结成册的象形文字。“典”,是个会意字,意为将册放在机子上,表示典藏之义。《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今天虽然未发现早于或与甲骨文同时的竹木简,但据《墨子·明鬼》中“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句可知,竹简和木牍被作为载体,还是很早的。中国的正式书籍,是那些用竹木为材料而写成的文字记录。

先秦时代,用竹简多。出土竹书有《纪年》、《周易》、《穆天子传》等,《穆天子传》流传至今。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知当时《易》是用竹简写成的。

东汉学者王充,在其所著《论衡·量知》篇中最早记载了简牍的制作方法:

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契,析之为版,乃成奏牍。

从西汉文献学家刘向的《别录》中得知,竹简在使用前,要经过烘焙,以防虫蛀,此为汗青或杀青:

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

至于版牍,也必须先锯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以刨制括削,经过精细的打磨,使之平滑,然后书写。

把简编连成册的绳子叫“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牛皮绳(韦编)或丝绳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好《周易》,“读《易》,韦编三绝”。简策翻看久了,绳子容易磨断,致使竹片脱漏,次序颠倒,不堪阅读,所以后人常称那些残缺不全、页码倒错的书为“断简残编”。

竹简大多以一篇文章编连为一策,如果此篇文章又属于某部书的一部分,则在篇名的底上

再加上书名。因为编简为册,文章又以一篇为单位,所以篇名就很重要。一般把小题(篇名)写在上面,大题(书名)写在下面,以便识别。

周代,简策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化的进步和普及,简牍的使用更加频繁,孔子删定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写在简策之上。那时的简策是人们记录思想、传播知识的主要书写材料。然而,它的弱点是笨重,不便翻阅,也难以携带。据说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公文,“衡石量书”,多达120斤,足见简策的重量。墨子南游,载书五车,可见简策的体积。东方朔上书汉武帝,用了3000根竹简,公车令两人共持其书,“仅能胜之”,而武帝读之,“二月乃尽”,可见简策阅读之不便。造纸术发明之后,人们还在使用简牍。直到公元四世纪,东晋桓玄下令“以纸代简”,简牍的时代才告结束。

据史书记载,汉、晋两代曾两次重大的竹简发现。一次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得战国竹简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经书,由于与当时通行的用隶书写成的经文不同,被称为“古文经”。后来由此还引发了今古文之争。另一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冢,发现了数十车竹简,经当时学者荀勖、束皙整理,得古书75篇16种,写成当时文字,共计十余万言,后世称之为“汲冢书”,著名的有《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它们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近人朱希祖有《汲冢书考》。

近数十年间,长沙楚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荆州郭店楚墓等都发现大批战国竹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6月在湘西里耶古城出土的2万余枚秦代竹简。这批秦代的简牍约20万字,字体属古隶,内容多为官署档案,涉及当时社会政治、行政设置、官职、民族等。它的出土,将改写和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

汉代竹木简发现亦多,如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发现竹简722枚;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简牍4900余枚,其中《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的出土,澄清了学术界百余年的争论,因而闻名世界。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有《诗经》、《周易》等十多种古籍。

在甘肃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置遗址,出土木简25000余枚。1996年,在长沙市走马楼出土三国时吴国简牍达十余万枚,超过当时全国历年出土的总和。

以上事例说明,我国以竹木简为载体,不仅出现得早,且延续时间亦很长。大批古代简策的出土,不仅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早期书籍及其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详尽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五、缣帛

缣帛是一种丝织品。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丝”、“帛”等字,《诗经·豳风·七月》就已叙写到“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墨子·明鬼》篇也有“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之语,可知在春秋战国时代,书写材料是竹帛并用的。当时竹木简虽然价格便宜,但过于笨重,且常常发生错简、散乱的情况,因此,在简牍盛行的时期,人们自然想到了利用缣帛一类的丝织品作为书写材料的一个补充。帛质轻薄平柔,折叠方便,便于携带,还能够随着文字的长短截取,易于流行,有着简牍难以比拟的优越性。不仅如此,缣帛还有简牍难以胜任的用途:一是用来绘制地图,可以不受竹木简宽度的限制;二是用以绘画;三是用来制作简牍的附图;四是可以用作简牍的定本。尽管缣帛比竹木简有很多的优点,然而,由于它成本高,价格贵,一般的人,一般的事

务是不会用它的,这就是它始终没有能取代简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纸

由于简策的笨重,缣帛的昂贵,影响了文字的广泛传播。于是,在我国人民的长期探索中,一种既携带方便,又价格便宜的新型书写工具——纸出现了,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东汉之后,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重要,当人们把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时候,我国古代书籍发展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纸写本的时代,这是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纸的本义,是指漂洗蚕茧时附在篦上的絮渣。后来以丝为原料的缣帛,有时也称为纸。“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后汉书·蔡伦传》)。早期的纸,除上述的丝质纤维纸外,还有一种麻质纤维纸,也就是植物纤维纸的早期形态,它们均比过去历史记载东汉蔡伦发明纸(公元150年)的时间早。

1957年陕西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古墓出土一批文物,内有铜镜,镜下为麻布,布下有纸,黄色,长宽约10cm,属麻纸,主要成分为大麻纤维。考古学家以为不晚于西汉武帝时(前140~前87)。当然,灞桥纸的年代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以后的30多年来,考古专家们又分别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陕西扶风县中颜村、甘肃敦煌马圈湾西汉屯戍遗址、天水市放马滩西汉墓等地发掘出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纸质文献。

从这些出土的大批实物来看,晋以前的古籍主要是简牍和帛书,用纸写成的文献尚无足够的发现,说明纸还没有得到普遍的使用。晋以后,纸质文献逐渐增多,与之相对,简牍帛书则少有发现。随着纸的广泛运用和流行,文献的书写材料由纸逐渐代替了缣帛、竹木。史载西晋文学家左思,用10年时间创作出《三都赋》,引起巨大轰动,豪门贵族争相传写,一时洛阳纸贵,可见西晋时期纸已经被广泛使用。从此确立了纸作为惟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从而结束了竹简时代。西晋作家傅玄有《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同,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南北朝至隋唐的纸质文献已达鼎盛时期。

七、胶片、拷贝、磁带、软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贮存、交流知识信息的技术不断更新,胶片、拷贝、磁带、软盘曾一时利用相关的技术和设备,在某些领域取代过纸张,作为一种新的文献载体运用过一时。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文献信息的存储设施越来越先进,这些文献载体逐渐被载体形式越来越小,但存储空间越来越大的新的文献载体所取代。

八、U盘、光盘、硬盘

信息社会的文献资源越来越丰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力量的壮大,也推动了信息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文献信息的贮存生产了新的存储载体——U盘、光盘、硬盘。这些文献存储载体的出现,不仅节约了大量的纸张,而且很快淘汰了胶片、拷贝、磁带、软盘等存储载体。U盘、光盘、硬盘等作为新一代的文献载体,虽然不可能完全取代于纸张这种载体形式,但与纸张并存,成为信息社会文献资源的重要载体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节 文献的形成与传承

一、文献的形成

文献的形成方式(有些人叫文献内容的体裁)大体归纳为著、述、编、译四种。凡是前无所承的个人创造,叫做“作”,也称为“著”或“著作”。凡是前有凭藉,个人只是提炼编次整理的,叫“述”,也称“编述”。凡是汇集纷杂的文献资料,加以分类排比的,叫“编”,也叫“纂”或“论纂”。把一种语言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献叫“译”。

(一)著

王充《论衡·对作篇》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吉页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这,故曰作也。”清代学者焦循在他的《雕菰集》卷七《述难篇》里,对“著”是这样论述的:“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觉而已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人们尚未知觉的理论知识,才可叫“作”。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第二编《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中也指出: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著作”。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仲尼厄而作《春秋》。”又云:“《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里的作,都是指一种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劳动。即如《史记》,司马迁称“作《五帝本纪》第一”,“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也是因为司马迁以为自己的《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作”。但当别人把《史记》比之于《春秋》时,司马迁则谦虚地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在讲创造、讲原创性时,我们也不能绝对化,而应当客观地、辩证地来认识所谓创造。一种新的知识,新的理论,要有客观的或历史的依据来支撑。因此,著作,关键是结论是不是新的,是不是前已有之,是不是仅就旧说稍加变通或稍加损益。同时,所谓全新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结合实际,是不是证据确凿可立于不败之地。迎合潮流,炫人耳目的标新立异,尽管是新的,但不是合格的著作。

古人对著作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也只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班固继司马迁《史记》作《汉书》,也只称“述”而不称“作”。如《太史公自序》云:“作《五帝本纪》第一”、“作《高祖本纪》第八”。《汉书·叙传》则只称“述《高祖》第一”、“述《惠纪》第二”。唐代颜师古注云:“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作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即便对司马迁《史记》,汉代一些人也认为是述而不是作。如班固谓司马迁“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汉书·司马迁传》)王充也是这样认为的:“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新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论衡·对作》)而王充对于自己的著作《论衡》,仅视为“论”,比“述”还次一等:“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由此可知王充多么谦虚,也可见古人不肯轻易拿一“作”字许人,也不轻以自许。在今天看来,无论《春秋》、《史记》,还是《汉书》、《论衡》,都是著作,而且是优秀的著作。对于“著作”的衡量标准,已远较古人宽泛了。

(二)述

述,就是编述,是指改编的概述性的作品。如果说著作强调的是“无本于前”、“前始未有”,那么“述”就是指“古已有之”,有所承继因袭。《说文》云:“述,循也。”前有人开创,后有人遵循;开创者为作,遵循者为述。

焦循也为“述”下了定义:“已有知觉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义欠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义复明,是谓之述。”(《雕菰集·述难》)张舜徽先生亦云:“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工夫,编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这叫做‘编述’。”

述的难度,并不亚于作。“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难就难在“明”上,这个“明”是要求准确领会作之本义,而不能主观臆断。如《诗·周南·关雎》这首诗,究竟是为何而作,本意为何,但因其创作原因没有文字资料为之说明,于是后代传授《诗经·关雎》的学者或用先儒旧说,或据对周初社会风俗礼仪道德的理解,来试图探索《关雎》作者创作的本义。而这种“述”还不能完全让人们或后人认可。于是出现若干种“述”,来说明那已隐晦的作诗宗旨。再如李商隐的《无题》诗。可见“述”实在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书如《诗》之毛传、郑笺,《春秋左传》之杜注,《水经》之酈注,《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注,《三国志》之裴注,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并不亚于著。可见著、述虽然不同,却不能仅仅依著、述来论高下。

(三)编

编,也叫纂、辑。指抄录、编排的资料性书籍。张舜徽先生谓“将过去繁多复杂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抄纂’。”张先生说的“抄纂”,即为“编”或纂、辑。今天我们见到的一些总集如《诗经》、《楚辞》、《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全上古先秦两汉六朝文》等,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天中记》等,丛书如《汉魏丛书》、《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都是编纂的成果。编纂的特点是:都有一定的体例;其条文或书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一般要求注明出处,但也有不注出处的。目前我们学习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各种参考资料,如《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有《杜甫研究资料汇编》、《韩愈资料汇编》、《三曹资料汇编》等等,都是编纂而成的。编纂是一门大学问,如上述资料汇编,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要正确对待资料类的书,它们往往可以给研究者、作家提供正确的有实用价值的资料。所以结合实际使用价值,来评定一本书的学术价值,而不仅仅看它是作是述还是“编”。我们这样介绍,是让大家了解古人写作的特点,避免用今人写作的规格去衡量古人。

(四)译

译,就是翻译。把一种语文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文献。是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郑鹤声先生《中国文献学概要》有专章讲述。这里仅略述一二。

1. 佛典翻译

佛典翻译始于东汉。据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一说永平三年(公元60)派张赛、秦景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法。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一说永平十八年(公元75)使者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得佛像、佛经,便用白马驮到首都洛阳,明帝特为建白马寺,供奉二人译经。二人译出《四十二章经》,成为我国最早的佛经汉译本。说见《出三藏记集·四十二章经序》、《弘明集·理惑论》等书。

可信的汉译佛经,起于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公元2世纪),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今伊朗一带)来,支娄迦谶、支曜从大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祥从康居国(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来,各有传译,自此佛经翻译事业渐盛。

安世高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华,到灵帝建宁四年(171)20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据晋释道安《众经目录》,共35部41卷(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现存22部26卷。属小乘学派(上座部)。安世高是安息国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将皇位让给叔父,出家修道。他译经用口述方式,由他人笔录。基本方式是直译。

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末年(166年前后)从月氏来洛阳,通晓汉语,学问广博,译经时代是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稍晚于安世高。所译基本属于大乘,是大乘佛典汉译的开始。

释道安(312~385年)是东晋前期重要的佛教文献学家和译师。他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冀县)。18岁出家。编集第一部译经目录《众经目录》。在《摩诃钵罗密经钞序》里提出译经的“五失本”、“三不易”,指明了今后译经的道路。他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因改姓释。出家人改姓释,自道安始。

东晋后期北方姚秦的鸠摩罗什,是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最杰出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343~413年)龟兹(今新疆库东一带)人。7岁随母出家。58岁始被姚光迎入关内,开始译经,直到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共译出近40部300余卷佛经。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自鸠摩罗什开始。他所译主要是龙树一系的大乘学说,如《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他运用达意译法,使中土易于接受,他所译经论大都保存下来,为中土僧侣所喜爱。赵朴初说:“他(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的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佛教常识问答》)

唐代,中国佛教趋于成熟,翻译也达到高峰,代表人物是玄奘法师。玄奘(600~664年),俗姓陈,名祜,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人。13岁在洛阳剃度为僧。贞观元年(627年)到长安。贞观三年趁北方灾荒,他西行至兰州,继而至瓜州,在胡人西般木陀导送下,渡瓠芦瓜河,度莫贺延沙碛,到高昌国。又经龟兹等西域多国,越大雪山,到北印度迦毕试国。贞观七年到北天竺那烂陀寺,在寺学习五年。又游历中印度、南印度、西印度等,于贞观十六年回那烂陀寺。玄奘在印度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共同推崇,被给予“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称。贞观十九年正月返回长安。到洛阳会见唐太宗,太宗因留他在长安弘福寺译经,所需由朝廷供给。贞观二十年撰成《大唐西域记》。22年译完《瑜伽师地论》100卷。是年冬,大慈恩寺建成,迎他入住。后又译成《大般若经》全部600卷。他在印度17年,行程5万里,足迹遍西域、印度百三十国。赵朴初谓他:“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回国后又译出经论75部1335卷,“他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佛教常识问答》)

据专家统计,从印度、西域译成汉文的佛教经、律、论、集、传等有1692部6241卷,著名的中外译师不下200人(《佛教常识问答》)。这是中国灿烂的古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汉译佛经外,还有藏译佛经。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五百年间,由印度和

西藏译师译成藏文的佛经,就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两藏者而言,就有 4000 余部,约当汉译一万卷。佛说的经律称为《甘珠尔》,佛弟子及祖师的著作称为《丹珠尔》。藏译佛经以空、有两宗的论典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最多,为汉译所无。前后印、藏译师达 350 人之多。

历史上还译出刻印过《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乾隆三十八年(1773)据汉文和藏文译,五十五年(1790)编译完毕,在北京雕板印刷,共 699 种 108 函,朱印。今布达拉宫有全帙。《蒙文大藏经》在元大德中由藏文译出,在西藏刻印。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修重刻《甘珠尔》(北京国家图书馆有康熙五十九年北京刻蒙文《甘珠尔》朱印本,存 107 函。)乾隆六年至十四年又校译重刻《丹珠尔》,有印本传世。(参见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

2. 学术翻译

学术翻译指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汉译。主要有三个高潮期:一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我国学者的合作翻译。二是清代后期西方学者与我国学者的合作翻译。三是 20 世纪初我国学者的独立翻译。当然,各期都存在独立翻译和合作翻译。

明末清初的重要翻译者有:

利玛窦(1552~1610 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通过宦官马堂,来到北京,向万历皇帝献天主图像、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物,赢得合法的传教地位。与他合作翻译的是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 年),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们合译了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后九卷直到清咸丰七年才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李善兰译出)。之后又合译了《测量法义》。徐光启又与意大利人熊三跋合译《泰西水法》(1612)等。徐光启又于崇祯元年奏设历局,延请西方传教士进京修历,先后被延请的有意大利人龙华民、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罗雅谷。中国人李之薄、李天经亦参与。历时五年,编译书籍 137 卷。入清,汤若望对李天经主持选刻的《崇祯历书》增译增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此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存 34 种 113 卷),这在天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代万历、天启、崇祯至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西方人翻译著述的学术书籍有 127 种(参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四库全书》就收了不少这一类书籍。

康熙末年,清政府与罗马教廷发生了“礼仪之争”,康熙 43 年(1704)罗马教皇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禁止基督教徒祭祀孔子,祭祀祖先。康熙皇帝因此驱逐教皇使者和传教士。雍正元年,清贵族苏努因支持皇八子胤禩得罪雍正。苏努全家传教,因而祸及天主教及葡萄牙耶稣会士穆致远,致使雍正进一步禁止传教。故雍、乾、嘉、道几位皇帝相继禁止天主教。西方科技及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也因而中断了约 120 年。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后,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位上设立译馆,委托魏源译《四洲志》。后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收集资料,编译成《海国图志》,影响很大。

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奕訢奏设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同文馆成立。始设英文馆,同治二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同治十一年(1872)设德文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设德文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设东文(日本)馆。同文馆负责培养外语人才,翻译西方书籍。